

影響國初中後教育分流的實證分析： 性別、省籍、與家庭背景的差異*

薛承泰**

* 本文部份乃根據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5)《分流教育與社會經濟地位》教改會委託研究報告第二章「教育分流與教育機會之不平等」為基礎改寫並作進一步分析與討論。感謝中央研究院「調查工作室」提供「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並謝謝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以及助理簡文吟、陳怡君協助蒐集資料與製作表格。

**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社會變遷」第二期第三、四次調查，共六千兩百位台灣民眾為對象，針對台灣社會的特性，以性別、省籍、和父母親教育，來描述國初中之後升學與教育分流的差異。整體而言，台灣教育水平不斷提昇，而且性別、省籍、與社經背景的差異也有縮減的現象，其中以性別特別明顯。省籍的差異雖然減緩了，外省人在教育的優勢仍然存在，尤其是外省人進入普通高中比例較其它省籍為高；本省閩南與客家教育水平雖不斷提昇，但以進入高職比例的增加最為明顯。此外，具有較高社經背景者，不論年齡群，繼續升學與進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也一直是偏高的。

經由多變項分析發現，家庭背景因素對教育取得（以年計）的影響力，隨著年輕人口有減弱的情形。然而，除了性別之外，背景因素的影響力對國初中後的升學並沒有減緩；至於分流的選擇，「普通高中」和「職業學校」所吸引的學生，更和家庭背景有相當的關連。此外，在給予不同階級背景（以父母教育程度為指標）的條件下，出生於民國四十五年之前人口群，初中畢業後的升學以及進普通高中的機率均以外省男性最高，非外省女性最低。至於出生於民國四十五年之後人口群，國中畢業後的升學，性別的影響力降低，然外省子女進入普通高中機率仍較非外省為高；無論如何，性別和省籍差異仍不若階級背景明顯。

簡單地說，台灣教育的擴充的確縮短了（尤其是性別間）教育機會的不均；然而在分流的教育過程當中，背景因素（按重要性依次為父母教育、省籍）仍然具有相當的作用。

關鍵字：教育分流，功績主義，階級複製，多重類別邏輯迴歸，文憑主義，文化複製

一、前言

從這個世紀以來教育普遍被認為是國民的權利與義務，教育的推廣也成為國力的重要指標之一（見羊憶蓉 1991,1994；張清溪 1994）；於是，教育改革一直是各個社會或國家發展的重心，而「教育出了問題」之類的大聲疾呼，在二次戰後更是不絕於耳！就拿近三十年美國的改革來說，五〇和六〇年代間自由主義興起、婦女解放、反越戰、反種族歧視……等運動瀰漫著整個社會，對於學校教育 (schooling) 的定位與內涵自然也受到影響；因此，接下來的十餘年（60年代末70年代初），教育改革主要的訴求強調「平等」(equality)、 「適切」(relevance)、 「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與「成長和發展」(growth and development) (Hurn 1985)。到了80年代，教育危機的本質已大為不同，其中不少是對過去改革的反挫。例如，批評學校過於強調平庸 (mediocrity) 而不追求卓越 (excellence)；對於為生活化而設計的「適切」課程，有人認為是一種矯飾，使學生有藉口逃避學習基礎課程；而開放入學資格擴大教育機會的作為，其結果卻影響到學術的水準。尤其令人扼腕的，過去被批評威權作為 (authoritarian) 的學校，如今卻被認為權威 (authority) 不足，學生自制不夠、導致師生倫理斲喪、校園秩序混亂 (Hurn 1985)。

自二次戰後以來，教育制度不僅在美國有如上述的變遷，在歐洲以及許多其它國家也有類似的變革。當然，除了社會環境的變遷之外，這段期間學術界的主張也隨之婆婆起舞，其中以「功能論」和「衝突論」兩種典範最具代表性 (Collins 1970)。功能論者認為「學校教育」(schooling) 是一個理性的設計，用來傳遞社會共同價值，提供學習知識與技能的場所，使年輕人能逐漸適應

日益複雜的社會 (Durkheim 1977)；學校並擔負區分賢與不肖以及拔擢優秀人才的角色，使有能力而且努力者能在社會中獲得較高的地位 (Davis and Moore 1945)。他們對不平等的基本看法，認為是社會的自然現象，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鼓舞那些有才能的人去爭取較高的社會地位 (Parsons 1970)。尤其在工業化的衝擊下，國家推廣廉價的「大眾教育」(mass education) 來因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果增加了一般群眾的教育機會；此外，出身背景對個人未來成就的影響，也會隨著工業化社會所需要的分工與專業訓練而逐漸被學校教育所取代 (Treiman 1970)。

持衝突論看法者卻認為，學校中所習得的認知技能，事實上並不太符合就業所需，學校只是製造一張張文憑，作為就業的敲門磚 (Collins 1979)。他們又認為，教育的擴張表面上在增加就學機會，促進機會的平等，實際上在保障既得利益。因此，學校的教學不在於知識的啟蒙或創造力的培養，而是一種社會控制，主要用來保障菁英的權力、複製階級或維持文化優勢，並不在提供有才能者一個流動的機制 (Bourdieu 1977, Bowles and Gintis 1976, Carnoy 1974)。

雖然五〇至六〇年代興盛功能論的說法，六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則是衝突論流行，而八〇年代以後呈現較多元的解釋；整體而言，二次大戰以來世界各國呈現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對於「學校教育」重視的有增無減，這可以由各個國家對學校教育的各種支出的增加以及各級學校入學人數的不斷上升得知（請參閱羊憶蓉 1991）。這種「教育擴充」的趨勢，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一大特色，儘管如此，教育擴充的內容與程度在各個國家差異極大，這可以由「義務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 的長短以及「教育晉階」(schooling transition) 與「教育分流」(educational track-

ing) 的設計來區別，而後者即為本文討論的重點。

二、教育分流相關社會學研究

學校教育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逐漸跳脫出宗教與貴族的掌控成爲公領域的一環，學校教育機會的增加與公平性遂成爲社會發展的重點。進入二十世紀後，教育機會增加與教育層級的延伸，更是如火燎原在世界各地展開來。此外，教育機會增加與教育層級的延伸往往形影不離，而且（如功能論者所言）作爲改善社會不均等 (social inequality) 的制度設計，它們是否如功能論者所期待，真的促進了社會均等，或是如「工業化論」(Treiman 1970) 所預測的，「承襲地位」(ascribed status) 對個人社經地位的制約將會降低？

除了教育機會增加之外，教育分流也是教育擴張的一環，其所呈現的意義，則包含教育機會的分配與升學過程，這些都是教育不均等的重要內涵 (Rosenbaum 1976)。尤其教育過程中分流的選擇，不僅會影響教育成就本身，也是未來個人社經地位的決定因素。從功能論的觀點來說，分流教育是因材施教的一種制度或措施，訓練不同人才以適應分工日細的「專家社會」(expert society) (Bell 1977)。基本上，這是一種理性且有效率的選才過程，使能力不同的人分別獲得適當的地位，也就是所謂的「功績主義」或「績效主義」(meritocracy) (Bell 1977)。然而不同於功能論的說法，Bowles and Gintis (1976) 採藉馬克思論點，以爲學校服侍現代資本主義秩序的利益，複製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價值觀與人格特質。因此，爲培育有效率的生產者與管理者，學校分別教授不同內容，並發展不同課程與相關組織，也就是所謂的「教育分流」，

這些作為無不是在維持一個高效率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在分流教育體制下，對於勞動階級則灌輸以守時、守規則、尊敬權威的概念，對於經理人員則以較具彈性、學習容忍、激發創造與革新能力為重點。

整體來說，教育機會均等在本世紀的發展趨勢究竟如何呢？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在《機會與改變》(Opportunity and Change) 一書中，曾針對出生在本世紀前半美國人全國隨機樣本作詳細的分析。一般而言，在不同年齡人口群 (cohorts) 的比較中，他們發現受教育年數在男女、黑白、農人與非農人之間的差別已在逐漸縮小，而且在義務教育階段中，某些家庭背景（如父親的社經地位）的影響力隨年輕人口而呈現下降的情形；不過，家庭背景對於高等教育的影響力，在不同年齡人口群當中並沒有明顯改變。這個現象 Simkus and Andorka (1982) 在匈牙利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

上述有關教育地位取得的研究中，雖然描繪出家庭背景和教育的一般關係，卻忽略不同年齡人口所經歷的教育擴充效應；Mare (1979,1980,1981) 指出，過去教育取得研究摻雜著教育分配原則與教育擴充影響的兩股力量，唯有將教育擴充的影響力抽離才可以解析家庭背景和教育取得之淨關係。Mare 於是提出「教育晉階」(school transitions) 的分析觀點，來控制教育擴充對不同年齡人口教育分配的差異。Mare 的作法許多學者起而效尤，例如 Shavit & Kraus (1990) 在以色列的研究，Smith & Cheung (1986) 在菲律賓的研究。大致來說，這些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影響力下降的現象只存在於基礎教育階段，而非在於次級 (secondary) 或高等教育的階段，這樣的結果往往被用來說明功能論的解釋是很有限的（通常只能解釋整個教育過程的前段）；至於高等教育階

段，家庭背景影響力存續不墜甚至上升，卻較符合「階級複製」(class reproduction) (Bowles and Gintis 1976) 或「文化複製」(cultural reproduction) (Bourdieu 1977) 的說法。

在台灣有關教育機會均等的研究，Chang (1992) 曾探討教育擴充和背景因素的互動關係，發現家庭背景因素對教育取得（包括中等與高等教育）的影響力隨著教育擴充而減弱的現象。Tsai and Chiu (1993) 曾應用 Mare 的模型，分析台灣地區三個年齡層（出生於 1919-1945, 1946-1955，和 1956-1968）家庭背景在四個教育晉階（國小、初中、高中、和高中後）中的影響。Tsai and Chiu 以家庭背景為主要解釋變項，發現這些因素的影響，在三個年齡層之間，並沒有固定型式。此外，他們比較不同教育晉階中背景因素的影響力，也沒有發現明顯的趨勢存在。Tsai, Gates, and Chiu (1994) 則進一步指出背景因素中父親教育在各個教育晉階最具解釋力，而省籍、階級、與性別對不同教育晉階也一直有影響力；其中在完成中等教育（初中與高中職階段），省籍的淨影響較為凸出。Tsai et al. (1994) 雖然論及台灣教育機會男女差別的減縮，性別淨影響不僅仍存在而且和出生年具有互動關係。

上述的研究隱含一個現象，即在「教育機會」均等的分析中，開始重視「升學過程」或稱之為「教育進階」的探討。然而，在我國當前的教育制度下，義務教育之後的升學，還面臨分流的「選擇」（通常為普通高中、高職、或五專）（註1）；因此，背景因素和義務教育之後分流的關係，即成為研究的重要課題（薛承泰 1994）。關於家庭背景與分流的關係的研究中，Sandefur, Hsueh, and King (1992) 曾剖析二次戰後美國黑人教育大幅提昇的實質意義，他們發現黑人在高等教育就學率的增加，事實上仍限於傾向二年制大學的分流選擇。他們強調，如果能同時

考慮升學過程及其途徑（即分流），才能顯現家庭背景和個人教育成就較完整的一面。（註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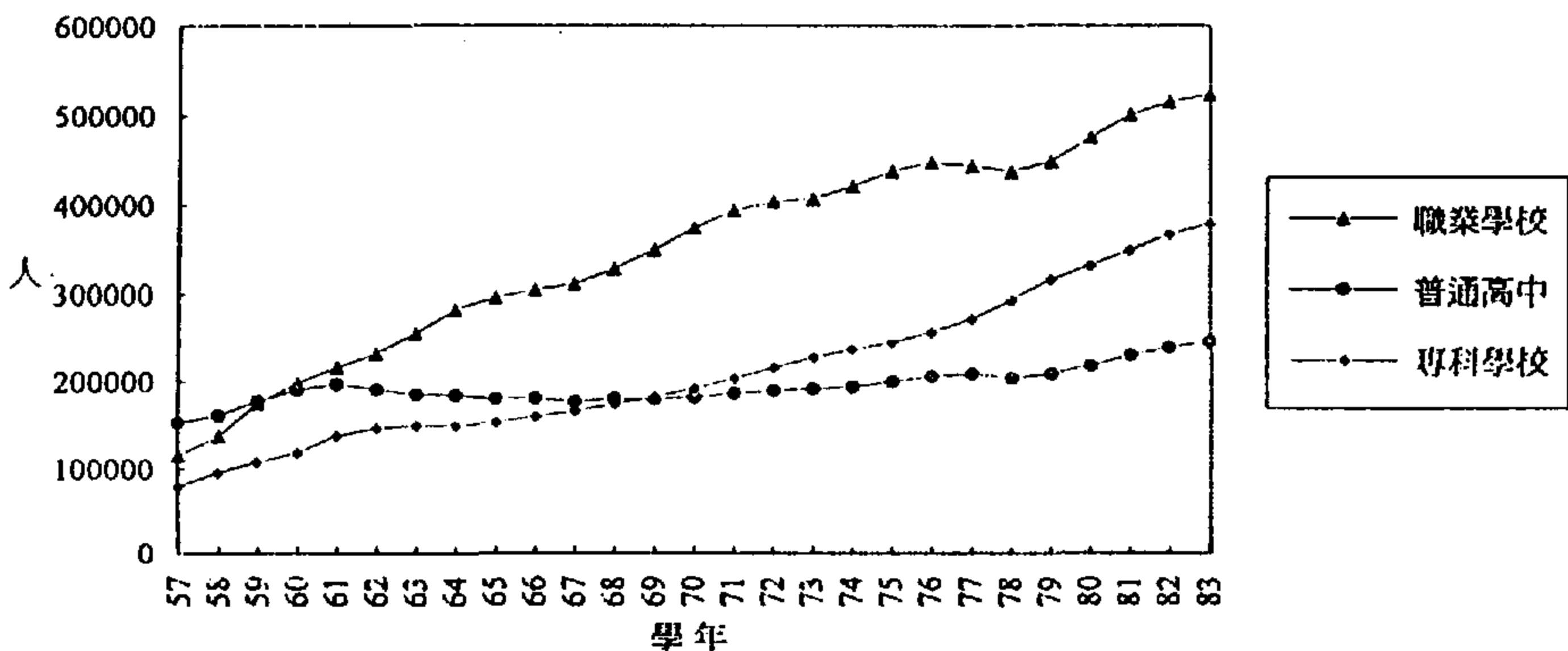
在台灣有關家庭背景與教育分流的研究已於近年出現，在薛承泰(1994)的研究中，比較中美兩國的年輕人，在義務教育完成後，教育晉階和家庭背景的關係。他發現在這群年輕人口中，不論在台灣還是美國，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在升高中職時較為明顯；到了升大專階段，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力較不顯著，剩下父親的社經地位為主要影響因素。此外，薛承泰還進一步指出家庭背景 and 不同分流的差別關係，但受到跨國比較資料的限制，他只針對美國方面的大學二年制與四年制。台灣方面的專科與大學的區分，來探討家庭背景對「分流」的影響；並且發現兩個地區都有一個情形，即家庭背景對子女進四年制大學的重要性較進二年制或專科為凸顯。

雖然薛承泰(1994)已注意到台灣教育的分流與家庭背景的關係，但他為避免不同年代教育結構的干擾作用，研究對象只限於出生於五〇年代中至六〇年代中的人口群；因此，有關家庭背景與分流教育，有必要擴大其範圍，以探討較完整的面貌。又由於台灣分流教育以國初中畢業後的升學為主，從上述研究的累積中得知，這應該包含國初中畢業後升學的決定以及在不同升學途徑中作選擇的兩個主題；換句話說，一方面探討教育晉階與背景因素的關係以呈現「教育機會」的分配，另一方面加入分流的考慮以凸顯「升學過程」的差異，這即是本研究分析的主體。

三、台灣教育分流的情形

戰後教育擴充的趨勢在台灣也不例外，民國五十七年以前，

台灣的義務教育只有六年，學校教育的分流點在於國民小學畢業後的升學——初中或初職。然而這個分流點並未被強調，以民國五十五學年度來說，初中學生人數為 456,090 人，初職學生為 44,789 人，兩者的比例超過了 10 : 1；也就是說，雖然有初職這個升學管道，實際上進入初職的學生並不多，大部份的學童仍是以初中為升學的選擇。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延長義務教育為九年，取消了初職，國小畢業生升學率顯著提昇，到六十學年度時已突破百分之八十，而當學年國民中學人數有 847,660 人之多；七十學年度時國小畢業生升學率更達到 97 %（教育部 1995）。而就從五十五學年度至六十學年度當中，高職學生人數由 83,102 人增加為 198,969 人，專科學生由 47,499 人增至 119,146 人（見圖一），兩者的成長差不多都是兩倍半，這個變遷使得高中生和高職專科生的比例從 1 : 1 降為 3 : 5；到了八十學年度，高中和高職學生比例更達到 3.1 : 6.9。圖一即顯示從五十七學年度至八十三學年度高中、高職、專科學校學生人數的變化，很明顯地，這 27 年間高中學生人數並沒有什麼變化，而專科與高職的學生人數卻是以超過了三倍快速增加。



圖一：台灣地區（民國 57-83 學年）高中職專科學生人數

雖然說，倉促實施「九年國教」多少是受到當局個人意志的影響，而事實上在民國五十七年時，前「經合會」也同時擬定「人力發展計畫修訂草案」，計畫預定至民國六十六學年度時，高中與高職五專比例為四比六；主要目的為了擴大培育經建所需技術人才，並緩和升學競爭。在民國六十一年所擬定「第四期人力發展計畫草案」，更明確指出這個比例將在七十學年度調整至三比七。可以說，在政府「人力規畫」下，高中和高職學生比例逐年下降的事實和經建政策之間是不無關連的（張清溪 1994）。很顯然，民國六十年之後進入普通高中、職業或專科學校，成為國中畢業之後升學的分流點，而「高職」似乎是政府「人力規畫」下所鼓勵的一個主要方向。

分流教育除了政策上的誘因之外，究竟和個人的出生或家庭背景有何關連？而這也就是功能論和衝突論兩個傳統的主要爭辯之一；然而，國內鑑於資料的缺乏，關於人們本身特質、家庭背景、以及族群特性和「分流教育」的關係，並沒有去充分瞭解；本研究即針對此，採用近年來的調查資料嘗試來分析。

四、研究資料與變項描述

本研究採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二期三次（I卷）和四次（I、II卷）（瞿海源 1992, 1993）中的三筆資料，合計樣本數 6,287 人，作為分析對象，試圖瞭解在上述分流教育制度下：1) 當下台灣人口不同年齡群、性別、省籍與社經地位（以父母親教育為指標）的教育取得與分流的情形，2) 分析前述家庭背景因素如何影響個人教育成就，以及 3) 分析獲取不同分流教育（普通高中、高職、或專科）的相關因素。

在這些分析當中，除了以「年齡群」（以出生年作為區隔）作為比較的基礎之外，性別和省籍也是比較的指標。年齡群的分隔在本章中採用民國四十五年為主要的基點，以出生在該年之前和出生在該年或以後為兩個主要次群體，主要原因是因為出生在四十五年者是就讀第一屆國民中學的主要人口群。然而因樣本人口年齡分佈在 20 至 64 歲之間（以調查時間為準），涵蓋範圍頗廣，本研究在描述部份進一步以出生民國三十八年以及五十年做二次區隔。選擇這兩個時間點，除了反映歷史（前者是國民政府遷台時間，後者在國中畢業時約為第七期六年經建計畫的開始），同時也能維持樣本數量分佈的均衡。

從表 4.1 得知，台灣地區民衆受教育年數平均為 9.4 年，其中男性為 10.2 年而女性為 8.7 年，男性比女性平均要多出 1.5 年的教育。此外，教育也隨著年齡而改變，而且不論性別，受教育年數隨著年輕人口一直在提昇。出生於民國 38 年以前者，男性平均教育為 7.7 年，女性為 5.1 年，男性比女性平均要多 2.6 年；民國 38 年至 44 年出生者，男性平均教育為 10.2 年，女性為 8.1 年，男性比女性平均要多 2.1 年；民國 45 年至 50 年出生者，男性平均教育為 11.6 年，女性為 10.2 年，男性比女性平均要多 1.4 年；民國 51 年至 61 年出生者，男性平均教育為 12.2 年，女性為 11.9 年，男性僅比女性平均要多 0.3 年。男女之間教育的差距逐漸在縮減，到最近出生的民衆男女教育幾乎沒有差別。

從上述的描述來看，台灣地區民衆在教育的取得上隨著時間已有顯著提昇，教育分配在性別間也越趨平等。由於教育年數的分配並不能顯示出求學的內容與過程，而這些都可能影響到往後的升學和社會經濟成就；準此，下面將以教育分流為重點，也就是以國（初）中之後的升學選擇（普通高中、高職、或專科）為分析主體，來了解不同年齡人口、性別、以及省籍的差異。（註 3）

表 4.1：台灣人口的教育（以年計）分配－按性別與出生別分

出生年	性別		總人口
	男性	女性	
民國38年之前	7.70	5.05	6.39
民國38-44年	10.40	8.15	9.21
民國45-50年	11.58	10.20	10.80
民國50年之後	12.20	11.91	12.04
平均教育年數	10.18	8.74	9.42

4.1 性別與教育分流的變遷

表 4.2 報告國初中之後教育分流，按「出生年」與「性別」分的百分比。根據該表，台灣民衆有超過一半（53.4%）學歷在高中以下，曾唸高中者佔 17.8%、曾唸高職者佔 23.5%、曾唸專科者佔 5.3%。在四個年齡層當中，「不升學」（即學歷為「高中以下」者）的比例隨著晚近人口而降低；相對的，國初中之後「繼續升學」（即曾進入「普通高中」、「高職」或「專科」者）所佔比例提高，其中尤以高職的增長速率最快。

教育的擴充在不同年齡層中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男女在不同年齡層間普遍呈現教育提昇的現象，其中以女性高職比例的提昇速度尤為明顯。至於不同性別接受教育分流的情形如何呢？根據表 4.2，男女在分流教育中的差別，在這四個年齡層中都逐漸在縮減；尤其對於出生於民國五十年以後的民衆來說，曾進入普通高中和高職的男女生所佔比例幾乎相同。

表 4.2：教育分流按出生年與性別分（百分比）

教育分流 出生年	高中以下	普通高中	高職	專科	列次數 (百分比)
民國38年之前	82.8	8.4	6.9	1.9	2058(33.2)
男性	76.1	10.7	10.3	2.9	1039(50.5)
女性	89.6	6.0	3.4	1.0	1019(49.5)
民國38-44年	60.9	17.4	16.8	4.9	1108(17.9)
男性	50.5	23.3	18.4	7.8	523(47.2)
女性	70.3	12.1	15.4	2.2	585(52.8)
民國45-50年	42.0	22.4	29.4	6.3	1184(19.1)
男性	34.2	27.5	30.4	7.9	517(43.7)
女性	48.0	18.4	28.6	4.9	667(56.3)
民國50年之後	23.6	25.5	42.3	8.6	1850(29.8)
男性	22.6	25.6	42.2	9.5	862(46.6)
女性	24.4	25.4	42.3	7.9	988(53.4)
行次數 (總百分比)	3312 (53.4)	1102 (17.8)	1458 (23.5)	328 (5.3)	6200 (100.0)

4.2 省籍與教育分流的變遷

在台灣以移民時間先後可分為四個主要族群，其中籍貫為「大陸各省」者（俗稱外省人），因其移民的特殊歷史政治環境，往往被視為「統治階層」而有異於其它的「被統治」族群。因此在分析族群間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往往以「外省人」作為對照，本研究也不例外。表 4.3 說明教育分流按出生年與省籍分佈的情形，族群間對於不同升學途徑的比例，以及這些比例在不同年齡群間的變化。在分析的有效樣本中共 6,185 位，其中本省閩南佔 74.6 %、本省客家佔 12.8 %、外省佔 12.0 %、原住民佔 0.5 %。

對於出生於民國 38 年以前的外省人來說，擁有高中或以上教育者比例（31.2 %）比其它三個族群高，客家人和閩南人的教育經驗則較為相似（雖然前者普遍較後者好些），原住民雖然在樣

本中只有9人，卻都沒有具備高中或同等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個年齡群中具有高中或以上學歷者比例，除了「原住民」因人數過少，不易看出趨勢外，其餘三個族群均不斷上升；其中「外省人」的比例從最年長到最年輕者分別為 31.2 %， 75.5 %， 84.3 %和 90.0 %；「客家人」為 17.1 %， 39.6 %， 66.2 %和 78.5 %；「閩南人」為 15.6 %， 34.3 %， 52.2 %和 73.4 %；「原住民」為 0.0 %， 16.7 %， 50.0 %和 45.5 %。

表 4.3：中等教育分流按出生年與省籍分（百分比）

教育分流 出生年	高中以下	普通高中	高職	專科	列次數 (總百分比)
民國38年之前	82.8	8.4	6.9	2.0	2049(33.2)
閩南人	84.4	6.8	7.3	1.5	1579(77.1)
客家人	82.9	9.3	5.9	1.9	269(13.1)
外省人	68.8	20.8	4.7	5.7	192(9.4)
原住民	100.0				9(.4)
民國38-44年	60.9	17.5	16.8	4.8	1106(17.9)
閩南人	65.7	14.2	16.0	4.1	836(75.6)
客家人	60.4	20.1	15.6	3.9	154(13.9)
外省人	24.5	39.1	24.5	11.8	110(9.9)
原住民	83.3			16.7	6(.5)
民國45-50年	41.8	22.4	29.5	6.3	1181(19.1)
閩南人	47.8	18.4	27.8	6.0	866(73.3)
客家人	33.8	26.0	38.3	1.9	154(13.0)
外省人	15.7	41.8	30.1	12.4	153(13.0)
原住民	50.0	25.0	25.0		8(0.7)
民國50年之後	23.6	25.5	42.3	8.7	1849(29.8)
閩南人	26.6	22.5	42.4	8.5	1335(72.2)
客家人	21.5	28.0	43.9	6.5	214(11.6)
外省人	10.0	37.4	41.5	11.1	289(15.6)
原住民	54.5	18.2	18.2	9.1	11(0.6)
行次數 (總百分比)	3312 (53.4)	1102 (17.8)	1458 (23.5)	328 (5.3)	6200 (100.0)

4.3 父親教育與分流

教育不平等是否在世代間傳承，是社會學者與教育學者一直所感到興趣的課題。在本節中，我們要探討父親教育和個人教育分流的關係，並檢視這種關係是否隨著時間改變，是否如同「工業化論」所預測的，子代的教育取得將逐漸減低對其出生或家庭背景的依賴？

表 4.4 說明教育和父親教育的交叉，對於各年齡群來說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父親教育程度愈高，子女學歷也愈高。從分流的觀點來說，父親教育程度高者，子女國初中畢業後升普通高中或專科的比例也較高；至於就讀高職的情況和父親教育程度的關係，在四個年齡層中似乎都呈現一個現象，即進入高職者的父親教育程度屬於中間者為多；而父親教育程度低者的子女升高職比例不高，是因為子女未繼續升學所佔比例偏高所造成的排擠現象。

父親教育屬中低程度（如初中或以下者）者，較傾向不升學或進入高職，這個現象尤其存在於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出生的三個年齡群，這隱含著分流教育下，「普通高中」和「職業學校」所吸引的學生有層化的現象；也就是說，出生較好的學生較有可能繼續升學且進入普通高中，出生較差者則較有可能不升學或選擇高職。如果觀察父親具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的人，發現幾乎不論出生年代為何時，有一半以上的人會進入普通高中。

雖然教育隨著年齡層普遍提昇，值得注意的，選擇進入高職的比例也隨著年輕人口而增加。特別在民國四十五年以後出生的兩個人口群當中，明顯地呈現出這樣的趨勢來，這個現象反映了當初的「人力規畫」政策。例如，在最年輕的人口群中，父親為不識字、小學、或初中者，進入高職的比例分別為 33.3 %，46.5 % 和 52.1 %，而進入普通高中的比例分別為 10.4 %，20.1 %，和

25.7%；相較於年長人口群，父親教育為中低程度者的年輕的人口群，進入高職的比例增加尤為明顯。

表 4.4：教育分流按出生年與父親教育分（百分比）

父親教育 \ 教育分流	高中以下	普通高中	高職	專科	列次數 (總百分比)
民38年之前出生	82.8	8.4	6.9	1.9	2058(33.2)
不識字	94.2	2.0	3.2	.7	1067(51.8)
小學	76.3	10.8	10.4	2.4	613(29.8)
國(初)中	73.7	12.1	10.8	3.4	232(11.3)
高中(職)	48.1	32.5	15.6	3.9	77(3.7)
專科	58.3	16.7	16.7	8.3	12(.6)
大學及以上	28.1	52.6	8.8	10.5	57(2.8)
民38-44年出生	60.9	17.4	16.8	4.9	1108(17.9)
不識字	85.8	5.6	6.2	2.4	339(30.6)
小學	61.8	15.4	19.0	3.8	479(43.2)
國(初)中	42.4	24.1	27.8	5.7	158(14.3)
高中(職)	19.4	45.8	27.8	6.9	72(6.5)
專科	13.3	46.7	20.0	20.0	15(1.4)
大學及以上	11.1	48.9	15.6	24.4	45(4.1)
民45-50年出生	42.0	22.4	29.4	6.3	1184(19.1)
不識字	68.8	11.3	16.9	3.0	266(22.5)
小學	41.7	19.3	33.8	5.2	592(50.0)
國(初)中	32.7	23.1	37.2	7.1	156(13.2)
高中(職)	12.2	45.9	27.6	14.3	98(8.3)
專科	6.3	50.0	28.1	15.6	32(2.7)
大學及以上	5.0	60.0	22.5	12.5	40(3.4)
民50年之後出生	23.6	25.5	42.3	8.6	1850(29.8)
不識字	53.2	10.4	33.3	3.2	222(12.0)
小學	26.2	20.1	46.5	7.1	968(52.3)
國(初)中	15.8	25.7	52.1	6.3	284(15.4)
高中(職)	6.6	44.9	30.8	17.6	227(12.3)
專科		47.8	37.0	15.2	46(2.5)
大學及以上	3.9	55.3	22.3	18.4	103(5.6)
合計 (總百分比)	3312 (53.4)	1102 (17.8)	1458 (23.5)	328 (5.3)	6200 (100)

五、背景因素和教育成就——多變項分析

前面已說明了台灣當前人口教育（包括分流）的分配情形，以及在不同社經背景、性別、省籍的差異與不同年齡群間的變遷。由於個人的出生環境背景對其教育成就，乃至於職業與收入都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本節的目的即以多變項分析，觀察社經背景（以父母親教育為指標）、性別、出生年、和省籍等對個人教育成就與教育分流的影響。

5.1 影響個人教育成就的因素

表 5.1 報告了個人教育取得（以年計）對這些背景因素的多變項迴歸分析，其中模型 1 是教育取得的基本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父母親教育對教育取得都有顯著影響，而父親教育比母親教育影響大。詳細一點說，每增加一年父親教育約可以提高個人 0.38 年的教育，而每增加一年母親教育約可以提高個人 0.24 年的教育，這個模型一共可解釋將近百分之三十的變異量。如果增加「性別」（1：男，0：女）控制變項（見模型 2），模型的解釋量增加約 3%，而且性別的影響力也是顯著的；模型 2 告訴我們，在父母親教育恆定下，男性平均比女性多出 1.46 年教育。

模型 3 比模型 2 多加了「省籍」變項（1：外省，0：非外省），省籍的影響力雖然達到顯著水準，卻是模型當中效應最小的控制變項，外省和非外省的教育差異約在 0.5 年。在模型 3 中加入「出生年」（1：民國四十五年之後，0：民國四十五年之前）即為模型 4，整個解釋勢力提高了 11%。出生年所帶來教育的差異超過了父親教育的影響，在其它變項控制下，出生民國四十五年之後比之前者平均相差約 3 年的教育成就。

出生年代的影響，基本上反映著教育結構的變遷以及不同年齡群人口特質與教育的關連性。以台灣的情形來說，於民國五十七年實施的「九年國教」，普遍提昇了出生於民國四十五年及以後者的平均教育年數，這可以說是「結構因素」所造成的差異。由於出生年受到結構因素影響至為明顯，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別就出生於民國四十五之前（年長群）與之後（年輕群）來分析，探討背景因素對個人教育影響在這兩個人口群的差異。

表 5.1：個人教育（年數）對背景因素的迴歸分析

模型	全 體				民45之前	民45之後
	(1)	(2)	(3)	(4)	(5)	(6)
常數項	6.498	5.809	5.815	4.789	3.955	9.093
父親教育	.382 (.387)	.378 (.383)	.366 (.371)	.308 (.312)	.385 (.376)	.200 (.275)
母親教育	.241 (.210)	.247 (.215)	.246 (.215)	.181 (.158)	.216 (.170)	.157 (.199)
性別（男）		1.458 (.165)	1.448 (.164)	1.563 (.177)	2.374 (.259)	.719 (.120)
省籍（外省）			.542 (.040)	.567 (.042)	.715 (.046)	.583 (.069)
45年出生（之後）				3.083 (.350)		
R ²	.297	.325	.326	.437	.337	.216
N	6200	6200	6200	6200	3164	3036

註：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標準化迴歸係數），係數未標明記號者皆已達 .05 或以上顯著水準。t-test # : $p > .1$, + : $.1 > p > .05$

模型 5 與 6 和模型 4 類似，所有的背景因素對教育都有顯著的正影響。然而，兩個模型所顯示的影響力並不相同，模型 5（年長人口群）具有較高的解釋力 ($R^2=33.7\%$)，每個控制變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值都比模型 6（年輕人口群）為高；也就是說，模型 5 中各變項對教育的相對解釋力較大。值得注意的，在年長群模型中，性別的淨影響力頗大，男女相差 2.4 年的教育，相形之下，在年輕群模型中男女差異就較小了，只有 0.7 年。

從模型 5 和 6 的比較，可知背景因素影響力在兩個年齡群間的變化；值得注意的，四個背景因素的影響力在年輕群中都較低，這意味著台灣地區教育成就的分配逐漸超越個人的家庭背景因素，也就是「承襲地位」有式微的趨勢。相較兩個年齡層人口模型，以性別影響力下降最明顯，由此可以預見將來男女教育趨於平等的可能，類似情形也在其它研究中發現 (Chang 1992, Tsai et al. 1994)。男女教育機會趨於平等和男女升學率變化有關，以台灣的情形來說，民國 70 年以後男女國小畢業後升學率都能維持在 97% 以上，而國初中畢業後的升學率，從民國 57 年開始，女性一直高於男性（教育部 1995:29 表 9）。

相對於性別，省籍影響力雖然較低，而且省籍效應的降低也較有限。這也許是因較年長外省族群移民的特質（為數不少的公職人員）而具有較好的教育水平；較晚出生的外省族群，在家庭背景控制下仍佔有優勢，則可能是一方面因家庭背景具有較優渥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DiMaggio 1982)；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其父母職業多為軍公教，子女教育費用有政府的補貼，這會帶來鼓勵升學的效果。（註 4）

5.2 影響國初中後繼續升學的邏輯迴歸分析（註 5）

前面有關家庭背景和教育取得的分析，所反映的只是一個整體概況，由於不同年齡群教育的取得會受到其所經歷教育結構

(九年國教的實施)與教育擴張(增加技職學校)的影響;因此,本節以教育晉階的觀點來分析,控制教育擴張的干擾,此外,以民國四十五年出生來區隔九年國教對不同年齡群的影響,在此分析架構下較能呈現背景因素與個人升學的關係。

在所使用的資料當中, 3,958 位國初中畢業生中有 2,947 位後來獲取高中職或以上的學位, 升學率為 63.8 %。(註 6)表 5.2 報告了國初中畢業繼續升學的多變項分析, 模型中顯示, 背景因素對於該階段升學具有顯著的正影響, 其中男性、外省籍、與出生於民國四十五年之後都是利於升學的因素。然而, 在兩個年齡群的對照中, 發現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為男性的升學優勢不再出現於年輕群中, 另一為外省升學優勢在年輕群中似乎更為明顯。此外, 有別於前面教育取得(總修業年數)的分析, 父母親教育對於是否升學的重要性, 並沒有在兩個年齡群中下降, 反而略為上升。

表 5.2 : 背景因素和國初中畢業後的升學——邏輯迴歸

	升高中職專科		
	全體	年長群 (出生民45之前)	年輕群 (出生民45之後)
常數項	-.668(.106)	-.781(.154)	-.218(.108)
父親教育	.131(.012)	.131(.020)	.139(.016)
母親教育	.100(.013)	.071(.022)	.117(.016)
性別	.291(.080)	.656(.137)	.090(.098)#
省籍	.645(.136)	.472(.204)	.781(.186)
45年出生	.468(.083)		
-2 LL	3989.073	1385.733	2582.821
正確百分比	75.16%	69.49%	77.56%
樣本數	3958	1226	2732

註: 係數未標明記號者達 .05 或以上顯著水準, 括號內為標準誤 t-test # : $p > .10$, + : $.10 > p > .05$

5.3 影響分流教育的多重類別邏輯迴歸分析

前面是以個人目前教育成就(以年計)(5.1節)以及國初中畢業後是否繼續升學做為分析的主題(5.2節)，本節主要探討的課題在於「背景因素是否會影響人們在分流教育中的選擇？」這個前題是視人們在完成國(初)中後，面對是否繼續升學？以及如果要升學，如何在「普通高中」、「高職」或「五專」中做「選擇」？當然，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升學的過程是很難以個人意志來「理性」選擇，有許多情況應該比較接近「被迫」選擇(Chang 1992)。為了分析的目的，本研究即假定個人在升學中，必須在這三種途徑擇一，否則就是不升學；準此，這裡所採用的統計分析為多重類別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表 5.3 即報告了多元邏輯迴歸的結果，表中的係數所代表的意義，乃為選擇某一升學途徑和「高職」的對照，例如第二欄中即為不升學和高職的對照，第三、四欄則分別為升入普通高中和高職，以及升五專和高職的對照。若要將升普通高中和不升學對照，只需將第三欄和第二欄係數相減即可，若要將升普通高中和升五專對照，只需將第三欄和第四欄係數相減，其餘依此類推。

首先在「不升學」和「高職」的對照中，以全體樣本的分析中來看，父母親教育高者傾向於選擇後者，男性或較年輕者也傾向於就讀高職。然而省籍因素的影響力並不顯著，主要是因為省籍在年長與年輕人口群中存在相反的影響力。(註7)也就是說，在其它變項控制下，年長外省人較傾向於不升學，而年輕外省人則多選擇高職。其實，家庭背景對「不升學」和「升學」(不論選擇哪一個途徑)的影響是很容易理解的，我們的重點應在於分

流當中三種選擇的對照，其中以「普通高中」和「高職」的比較尤為討論的重點。

表 5.3：分流教育（普通高中、高職、和專科）對背景因素的多重類別邏輯迴歸

	不升學/職業學校	普通高中/職業學校	專科學校/職業學校
常數項	1.130(.115)	-.903(.126)	-2.520(.200)
45之前	1.086(.173)	-.806(.200)	-2.676(.344)
45之後	.406(.113)	-1.502(.125)	-2.777(.194)
父親教育	-.087(.013)	.083(.013)	.088(.020)
45之前	-.095(.022)	.057(.023)	.039(.036)#
45之後	-.096(.017)	.096(.016)	.111(.024)
母親教育	-.069(.014)	.039(.013)	.042(.020)
45之前	-.023(.024)#	.047(.023)	.080(.037)
45之後	-.094(.017)	.042(.016)	.030(.023)#
性別	-.152(.085)+	.198(.083)+	.436(.127)
45之前	-.364(.154)+	.272(.164)+	.841(.278)
45之後	-.005(.103)#	.149(.097)#	.307(.146)
省籍	-.131(.134)#	.299(.112)	.259(.165)+
45之前	.579(.232)	.620(.228)	.778(.322)+
45之後	-.581(.185)	.221(.131)+	.104(.193)#
45年出生	-.827(.091)	-.514(.092)	-.233(.142)+
	-2* log-Likelihood	樣本數	
全體	9467.3	3958	
45之前	2938.4	1226	
45之後	6478.6	2732	

註：係數未標明記號者皆已達 .05 或以上顯著水準，括號內為標準誤 t-test # : $p > .1$, + : $.10 > P > .05$

在全體樣本的分析中，「普通高中」和「高職」的對照顯示，父母親教育高者傾向於選擇普通高中，男性或外省籍也傾向於就讀普通高中，對出生於四十五年以後的人來說進入高職的可能較高。若針對民國四十五年前後出生的人分別來分析，發現性別和省籍的影響力在年輕人口群中減低了，性別的影響力甚至消失了。這個現象可能和聯考有關，使得性別與省籍因素無法左右進入普通高中或高職。

在專科和高職的對照中，父母親教育高與男性傾向於就讀專科。省籍與出生年在這組對照中，似乎不是很明顯；尤其在年輕群中，省籍的影響力幾乎不存在了。專科和高職同屬於技職體系，但前者教育年限較長，具有較高的聲望。由於這兩類學校在數量上的明顯擴充，使得入學考的影響可能不如家庭投資意願來的重要；因此，對於進不了普通高中而願意升學者，在文化價值的期待下，兒子似乎比女兒較易獲得家庭的教育投資而進入五專。

爲了具體說明家庭背景和國初中後分流的關係，將表 5.3 分析結果，以父母的教育程度來當作階級背景（共分爲三個階級：父母親皆爲國小畢業，父母親皆爲初中畢業，父母親皆爲高中職畢業），並以此條件將「對數成敗比」(log-odds) 係數換算成機率，分別在表 5.4，5.5 與 5.6 報告，並且於附錄一中按年齡群與階級以圖來表示不同性別與省籍的升學與分流選擇機率。

表 5.4 的報告乃基於父母親教育程度皆爲國小程度（簡稱階級一）所計算出來的機率。很明顯的，在兩個年齡群之間最大的變化是在於「不升學」機率的降低以及「升高職」機率的上升；至於升普通高中或專科，整體而言則沒有明顯變化（見附錄一）。增加升高職的機率，如前所述，主要拜職業教育擴充所賜；其中在年長群中，非外省進入高職的機率要明顯高於外省，在年輕群

中無論省籍或性別，進入高職機率均提昇而都介於 41%-48 % 之間。在年長群中，女性升學機率低於男性，而值得注意的，外省低於非外省；但是在年輕群中，外省的升學率明顯高於非外省，男女差異則不明顯。至於在父母都是國小程度的條件下，誰比較有機會進入「普通高中」？答案是：外省男性機率最高，最低者則為非外省女性。

表 5.4：國、初中畢業後的分流選擇機率按出生年、性別、省籍分——階級一

省籍 \ 教育分流	不升學	職業學校	普通高中	專科學校
45 年以前出生樣本				
男性非外省	29.5	29.1	31.9	9.5
外省	32.6	18.0	36.6	12.8
女性非外省	42.5	29.1	24.3	4.1
外省	48.1	18.3	28.7	5.7
45 年（含）以後出生樣本				
男性非外省	21.1	44.1	26.1	8.7
外省	12.0	45.0	33.2	9.8
女性非外省	22.5	46.8	23.9	6.8
外省	13.0	48.4	30.8	7.8

階級一：父母親教育程度皆為國小畢業（6 年教育）

在父母親皆是初中畢業的條件下（階級二）（表 5.5），年長群非外省男性初中畢業後，未繼續升學的機率為 .194，升高職的機率為 .272，升普通高中的機率為 .407，升專科的機率為 .127。相同條件下，外省男性未繼續升學的機率為 .209，升高職的機率為 .165，升普通高中的機率為 .458，升專科的機率為 .167。值得注意的，在父母親都是初中程度的條件下，非外省男性初中畢業

後繼續升學的可能性反而比外省男性高了 .015。然而，非外省升學機率較高主要是在於高職部份的升學，至於升普通高中和專科的機率，非外省男性仍然低於外省男性。上述情形一樣存在於外省與非外省女性的比較中。

表 5.5：國、初中畢業後的分流選擇機率按出生年、性別、省籍分——階級二

教育分流 省籍	不升學	職業學校	普通高中	專科學校
45 年以前出生樣本				
男性非外省	19.4	27.2	40.7	12.7
外省	20.9	16.5	45.8	16.7
女性非外省	30.4	29.7	33.9	6.0
外省	33.9	18.6	39.4	8.1
45 年（含）以後出生樣本				
男性非外省	11.0	40.6	36.3	12.2
外省	5.8	38.4	42.9	12.8
女性非外省	12.0	44.2	34.1	9.8
外省	6.4	42.4	40.8	10.4

階級二：父母親教育程度皆為初中畢業（9 年教育）

同樣在父母都是初中畢業的條件下，年輕群中非外省男性國中畢業後，未繼續升學的機率為 .110，升高職的機率為 .406，升普通高中的機率為 .363，升專科的機率為 .122。相同條件下，外省男性未繼續升學的機率為 .058，升高職的機率為 .384，升普通高中的機率為 .429，升專科的機率為 .128。和前面年長群情況不同，在階級二的條件下，年輕外省男女繼續升學的可能性高於非外省（均約五個百分點），而且外省人升普通高中的機率也比非外省人為高。

當父母皆為高中職（12年）學歷時（階級三），年長群中非外省男性初中畢業後，未繼續升學的機率為.124，升高職的機率為.238，升普通高中的機率為.485，升專科的機率為.158。相同條件下，外省男性未繼續升學的機率為.125，升高職的機率為.140，升普通高中的機率為.532，升專科的機率為.203。年輕群中非外省男性國中畢業後，未繼續升學的機率為.052，升高職的機率為.337，升普通高中的機率為.456，升專科的機率為.155。相同條件下，外省男性未繼續升學的機率為.026，升高職的機率為.305，升普通高中的機率為.512，升專科的機率為.155。

表 5.6：國、初中畢業後的分流選擇機率按出生年、性別、省籍分——階級三

教育分流 省籍	不升學	職業學校	普通高中	專科學校
45 年以前出生樣本				
男性非外省	12.4	23.8	48.5	15.8
外省	12.5	14.0	53.2	20.3
女性非外省	20.2	28.1	43.7	8.1
外省	22.1	17.2	49.9	10.8
45 年（含）以後出生樣本				
男性非外省	5.2	33.7	45.6	15.5
外省	2.6	30.5	51.2	15.5
女性非外省	5.8	37.6	43.9	12.7
外省	2.9	34.3	49.9	12.9

階級三：父母親教育程度皆為高中職畢業（12年教育）

在階級三的條件下，年長群升學率的差異主要在性別而不是省籍，而年輕群升學率的差異主要在省籍而不是性別。至於分流

的選擇，在年長群中，外省進入高職機率低於非外省，但是進入普通高中和專科的機率卻一致高於非外省；在年輕群中，雖然這種差異形式仍然不變，但差異的程度已經很有限了（見表 5.6）。

整體而言，出生在民國四十五年之後者較出生於民國四十五年之前，國初中後繼續升學的比例顯著提昇，其中以進入高職的機率增加最多，這是政府擴大技職教育機會的結果；然而，父母親教育程度較好者，就讀普通高中或專科的可能性較高。至於分流的選擇，一般而言男性較女性可能進入普通高中或專科，外省較非外省人可能去讀普通高中。值得注意的，對於出生於民國 45 年之前的人來說，當父母皆為國小或初中程度時，外省子女初中畢業後繼續升學的可能性反而比非外省子女低，雖然如此，外省子女升普通高中和專科的機率仍是比非外省子女高。對於出生於民國 45 年之後的人來說，無論所屬階級為何，外省子女國中畢業後的升學率均比非外省子女高，進入普通高中與專科的機會也比非外省子女高。若從附錄一按階級與年齡層所做的圖來看，影響國初中後升學與分流的背景因素中，當以階級（父母親教育）為最明顯；省籍和性別固然存在如前述的影響，但在各個階級中的升學與分流情形，年輕人口顯然比年長人口呈現較高的相似性。這隱含家庭階級背景對於日後子女升學和分流，將更具關鍵性。

六、結論

五〇和六〇年代功能論的說法憧憬著「現代」(modern)、「自由」(libert)和「普遍性」(cosmopolitan)的理想(Hurn 1985)；然而歷經改革後，發現社會並不如預期的那樣，不均的現象依然存在，而教育的擴充甚至還帶來更多的失業。功能論相信社會權

化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基本上和衝突論的說法較為接近。

在多變項分析當中，父母親教育、性別、和省籍都會影響個人教育的取得（以年計）；然而這些影響力隨著年輕人口而下降，其中以性別最為明顯，這個現象似乎比較接近功能論的主張，尤其支持了「工業化論」的假設。可是，從升高中職的機會來看，除了性別外，其它背景因素對升學的效應並沒有隨年輕人口而下降；最後，對於分流選擇的分析中，再度肯定家庭背景（父母親教育）對於進入普通高中的重要性，這些結果卻顯然不是功能論者所期待的。

一般來說，出生在民國四十五年之後者相較出生於民國四十五年之前，國初中畢業後繼續升學比例顯著提昇，其中以進入高職的機率增加最多，這和政府擴大技職教育機會有關。可是這個現象對於父母親教育程度較好或外省人來說，比較不明顯，因為他們就讀普通高中機率一直偏高。家庭背景所帶來的優勢，在世代間傳遞甚至繁衍，透過政策來改變，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未必是明智之舉，也未必有效，而通常的作法為繼續「教育擴張」，以期待普遍教育的再提昇，拉近不同階級背景之間基本教育機會的差異。然而，這種作法可能導致文憑主義抬頭，背景較好者競逐「菁英」文憑或明星學校，以維持或提昇其地位。

省籍的影響雖沒有家庭背景大，其造成的差別卻具有「社會不公平」的實質意義。本研究發現，省籍的教育效果在不同年齡層間延續，其原因除了外省族群原來就具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對子女升學的期待可能較高，因此在社會化過程中傳遞其教育的優勢給下一代；再者，因其職業多為軍公教，政府的教育補貼，也可能帶來鼓勵子女走向繼續升學的分流軌道上。這個現象當隨著不同省籍者進入公職，而淡化省籍間的差異；附錄一兩個年齡群

的對照，已顯示性別、省籍差異在各階級內的聚合現象 (convergence)。

教育改革涉及層面相當複雜，而本文所能掌握的只是有關教育分流與家庭背景的一角而已，對於能直接影響分流的「聯考」卻未能掌握，實為遺憾！這個課題的深入探討具有相當意義，有待日後取得適當資料來分析，對於台灣地區分流教育的了解才較完整。無論如何，我國過去二十餘年經濟發展政策對技職教育的強調，的確有助於國初中後升學率的提昇，可是也相對剝奪了人們（尤其是「弱勢」子弟）進入普通高中甚至大學的機會。從教育取得的觀點，本文的分析呈現了功能論的某些說法；然而，從升學與分流的選擇來看，某些衝突論的影子仍然存在。台灣過去二、三十年教育的擴充的確縮小了（尤其是性別間）教育機會的不均；然而在分流的教育過程當中，背景因素（按重要性依次為父母教育、省籍）仍然具有相當的作用，或許應該說，功能論或衝突論都無法解釋台灣的教育現象。

註 釋

註1：嚴格來說，教育分流未必能夠自由選擇，尤其受到考試（如聯招）的影響 (Chang 1992)。

註2：在國外雖然曾有學者指出分流促進了階級區隔 (Oakes 1985)，真正拿出經驗證據支持者卻很有限；尤其大部份分流的研究，重點置於「能力分群」(ability grouping) 的教學效果上（見 Hurn 1993 第六章的整理），例如 Gamoran and Mare (1989) 曾分析美國中學分流教學的階級色彩，及其差別學習效果。

註3：至於普通高中、高職、和專科的認定，前者是以最後學歷為普通高中、大學、或研究所為指標，高職和專科則以最後學歷為準。這種作法可能高估「普通高中」的比例，因為樣本中應存在少許經由高職或專科進入大學者。

- 註 4：林忠正、林鶴玲 (1992) 曾跟計算省籍間職業與經濟之差異，證實外省人集中公共部門比例偏高。在 Chang (1992) 的研究中也發現，父親為「軍公教」對兒子高中教育，以及女兒大專教育機會有顯著影響。Chang 將父親為「軍公教」的影響力解釋為「軍公教」教育補貼效應，應可接受；至於為何在不同教育階段與性別產生差別效應，則未有進一步分析。
- 註 5：筆者所知國內 logistic regression or logit 的翻譯至少有「邏輯迴歸」、「洛基迴歸」、「羅吉斯迴歸」、和「對數迴歸」，由於社會學者大都者採用「邏輯迴歸」，筆者只好隨俗。
- 註 6：在多變項分析中，已將 34 位原住民和 7 位資料不明者剔除。
- 註 7：值得注意，出生於民國 20-30 年之前外省人，包含了教育變異極大的政府雇員與軍人，其教育對下一代的效應較難解釋（見 Tsai 1992, Tsai et al. 1994）。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羊憶蓉

- 1991 〈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的反省〉。頁 133-170，賴澤涵和黃俊傑主編《光復後台灣地區發展經驗》。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1994 〈教育的權利與義務〉。頁 31 - 77，羊憶容和林全等著《台灣的教育改革》。台灣研究基金會叢書，前衛出版社。

林忠正、林鶴玲

- 1992 〈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國家政策雙週刊》32:4-5。

教育部

- 1995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教育部。

張清溪

- 1994 〈教育與人力規畫〉。頁 281 - 311，羊憶容和林全等著《台灣的教育改革》。台灣研究基金會叢書，前衛出版社。

薛承泰

- 1994 〈影響學位取得的家庭因素——中美跨國比較之研究。〉《台大社會學刊》23:217-252。

瞿海源 (主編)

- 1992 《台灣地區社會變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三次調查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1993 《台灣地區社會變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四次調查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英文部份

Bell, Daniel

- 1977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Pp.607-634 in Karabel, J. and A.H. Hals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p. 487-510 in Karabel, J. and A.H. Hals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wles, Samuel and H. Gintis

-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Carnoy, Martin and Henry Levin.

- 1986 "Educational Reform and Class Conflict." *Journal of Education* 168: 35-46.

Chang, Ching-Hsi

- 1992 "Historical Trends in the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Taiwan." 《經濟論文叢刊》20(1): 23-50。

Collins, Randall.

-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77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002-1019.

Davis, Kinsley and Wilbert E. Moore

- 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42-249.

DiMaggio, Paul

-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89-201.

Durkheim, Emile

- 1977 "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Pp. 92-104 in J. Karabel and A.H. Hals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Featherman, D.L. and R.M. Hauser

-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amoran A. and R. D. Mare

- 1989 "Secondary School Tracking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Compensation, or Neutr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146-1183.

Hurn, Christopher J.

- 1985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Schooling: An Introduction of Education*. 2nd.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1993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Schooling: An Introduction of Education*. 3rd.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Mare, Robert D.

- 1979 "Social Background Composition and Educational Growth." *Demography* 16: 58-71.
1980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5: 295-305.
1981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72-87.

Oakes, Jennie

- 1985 *Keeping Track: How Schools Structure Inequ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arsons, Talcott

- 1970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Modern Society, or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visited." Pp.13-72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edited by Edward O. Laumann. Indianapolis, Ind.: Bobbs-Merrill Company.

Rosenbaum, James E.

- 1976 *Making Inequality: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High School Tracking*. New York: Wiley.

Sandefur, G.D., C.T Hsueh, and J. 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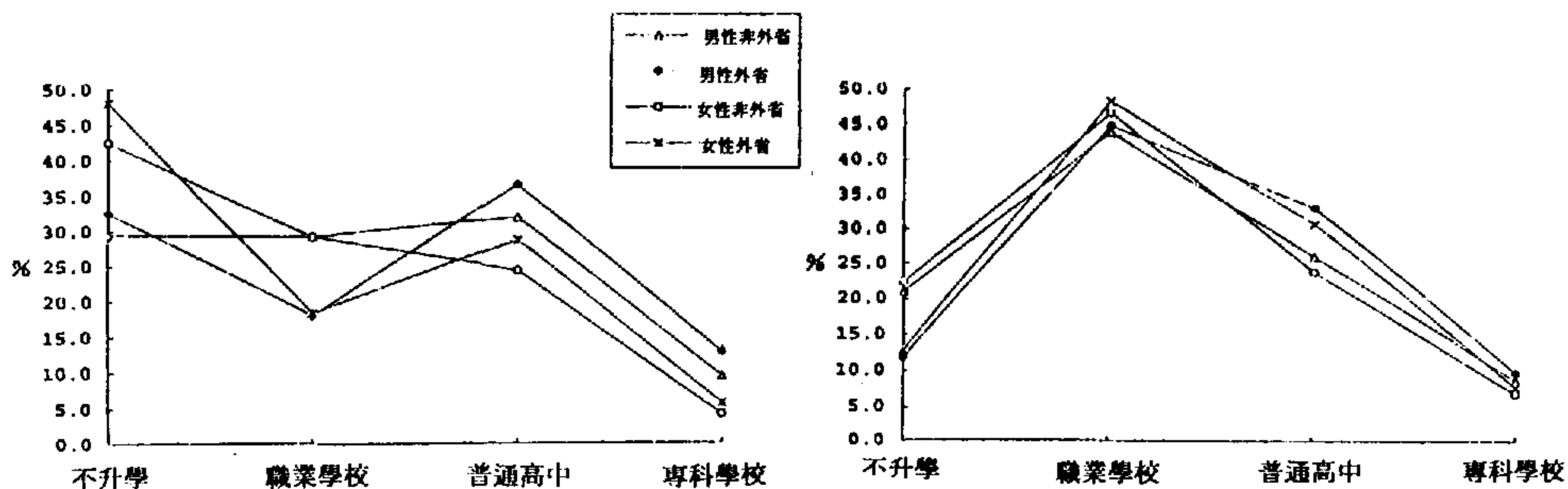
- 1992 "Racial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College Attendance and College Gradu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 Shavit, Y and V. Kraus
1990 "Educational Transitions in Israel: A Tes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redentialism Hypothes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3: 133-141.
- Simkus, A. and R. Andorka
1982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Hunga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740-751.
- Smith H. L. and P.L. Cheung
1986 "Trends in the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hilippin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387-1408.
- Treiman, Donald 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Pp.207-234 in Edward O. Lauman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Tsai, Shu-ling and Hei-Yuan Chiu.
1993 "Change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aiwan." Pp. 193-227 in Y. Shavit and P. Blossfeld (eds.) *Persis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hirteen Countries*. CO: West-view Press.
- Tsai, Shu-ling, Gates Hill, and Hei-Yuan Chiu.
1994 "Schooling Taiwan's Wom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id-20th Centur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 243-263.

附錄一：教育分流機率按階級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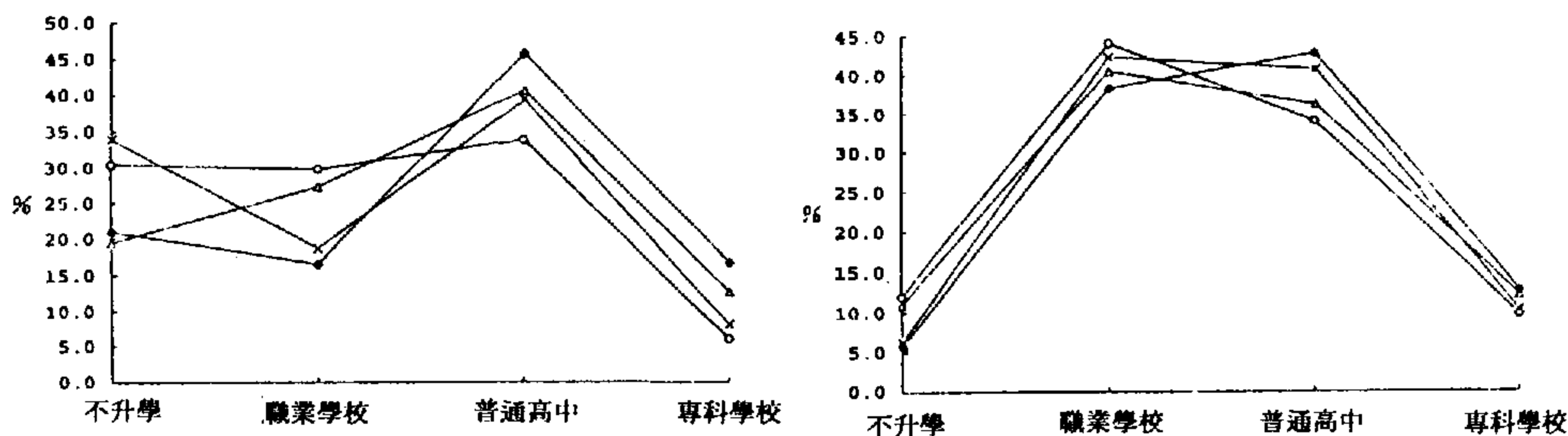
1. 年長群（出生於民國 45 年之前）

2. 年輕群（出生於民國 45 年及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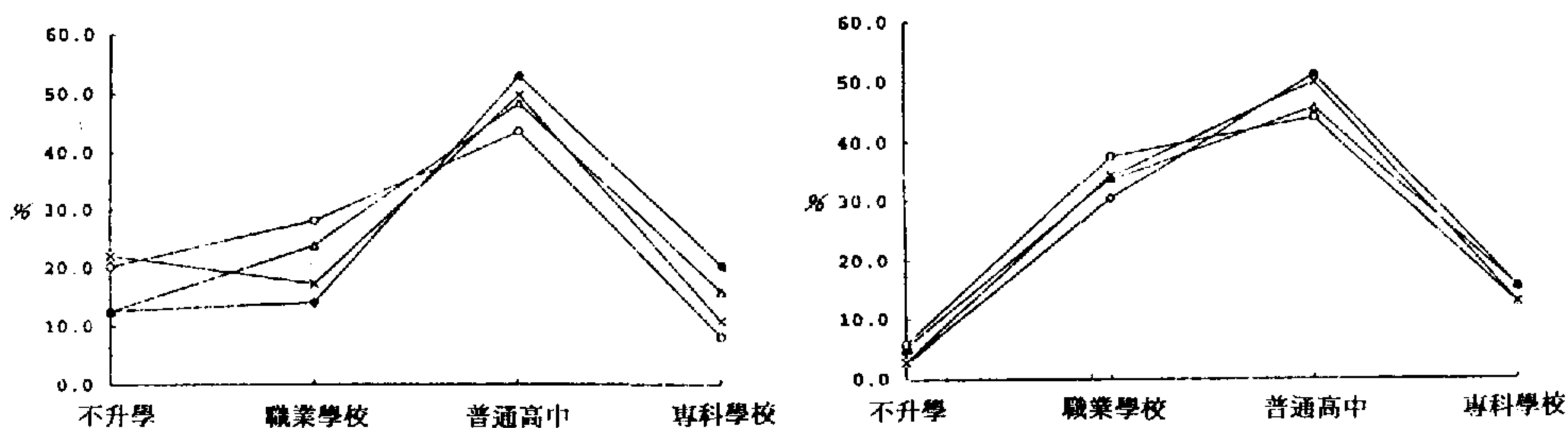
階級一：父母親皆為國小畢業



階級二：父母親皆為初中畢業



階級三：父母親皆為高中職畢業



Analyzing the Family Background Effect on the Tracking of Post-Junior High Education

Cherng-Tay HSUEH*

(ABSTRACT)

Entering into different educational tracks may affect an individual's futur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s as well.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that help interpret the track (high school, vocational schools, or professional schools) that an individual entered after graduating from junior high. By using data sets (N= 6,200) from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1992-93 waves", I first describe the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mong males and females, depending upon ethnic groups, social class, and cohort. Indicated by both years of schooling and educational progression, it shows that the educational inequality has generally declined over cohorts, although differentiations still exist with respect to ethnicity and particularly social class. By controlling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ethnicity, the logit models show that individuals of higher class background are more likely to get further education and to enter a high school track. All things being equal, there is an educational converge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of the younger cohorts born after 1955, who were first affected by the policy of 9-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initiated in 1968.

keywords: class reproduction, educational tracking, meritocracy, 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credentialism, cultural reproduc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